

# 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比较

高善文<sup>1</sup>

2019年12月10日

## 内容提要

我们将过去 8 年中国经历的经济转型，与类似时期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发现在经济增长率、城市化、出口和制造业竞争力等指标上，中国的总体表现是接近的；但在投资率、杠杆率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领域存在一些压力，这可能进一步影响未来十年（即 2020-2030 年期间）的经济表现。

---

<sup>1</sup> 首席经济学家，gaosw@essence.com.cn，S1450511020020

2010年10月我们撰写了研究报告《三十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潜在增速的趋势转折》（全文见附录），在文章中我们讨论了2011-202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变化及其影响。当时我们在中性情景假设下的估算认为，到201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可能下落到7%左右，到2020年进一步下降到5.5%左右。同时我们在文章中提出在经济潜在增速下行趋势中，政府可能持续采用逆周期政策，这将在经济中积聚大量扭曲和潜在的金融风险。差不多十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些推算的偏差并不算很大，关键的想法也差强人意。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走在长期波动下行的趋势中，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逐步从模仿和追赶驱动的模式转入自主创新驱动的模式，逐步从依靠出口和投资转入依靠消费和服务来拉动经济。

站在当下，如何评价过去十年我国的经济转型？如何看待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尝试把中国经济的转型放在东亚经济体转型的背景下来比较和分析。

为了进行这样的国际比较，首先需要把中国经济的转型与东亚经济体历史上的转型进行合理对标。为了寻找恰当的对标年份，我们使用了两个指标，一是人均GDP，把它转化成美元的水平，并对美元的币值在历史序列上进行调整。二是观察经济体内部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占比的变化。

结合这两个指标的观察，我们确立了经济转型的对标年份，如表1所示，即中国2010年的经济发展程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大致接近于日本1968年前后的水平、韩国1991年前后的水平、中国台湾1987年前后的水平。

表 1 中国发展阶段与日韩中国台湾的对标

	中国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对标基准	2010	1968	1991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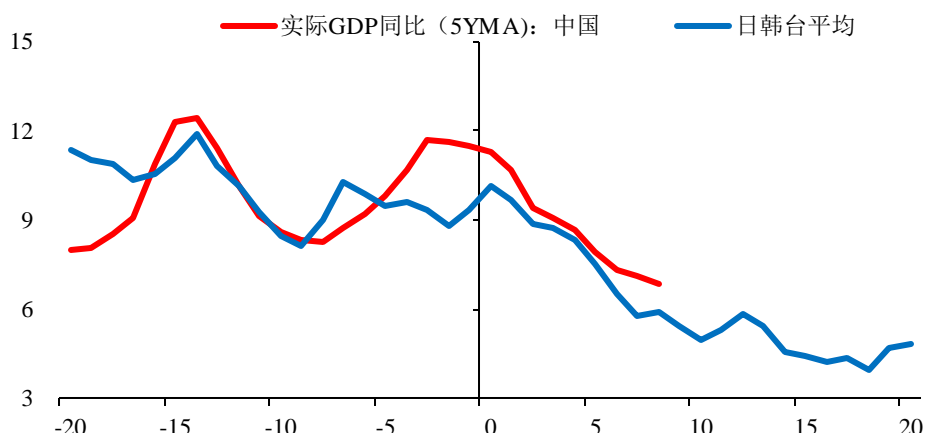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

基于这样的对标，我们对比各经济体主要的经济指标。

首先观察经济增长率。我们把对标的这一年作为观察的元年，观察这些经济体在元年之前二十年和之后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考虑到数据在短周期上波动较大，我们对经济增速进行了移动平均。

数据的结论一目了然，如图 1 所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有自身的特性，但是就过去转型十年的情况而言，中国所经历的经济增速中枢不断下沉，在东亚其他经济体转型过程中都经历过；在相应的年份上，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三者的平均经济增速与我国大致接近。

图1: 转型中的实际 GDP 增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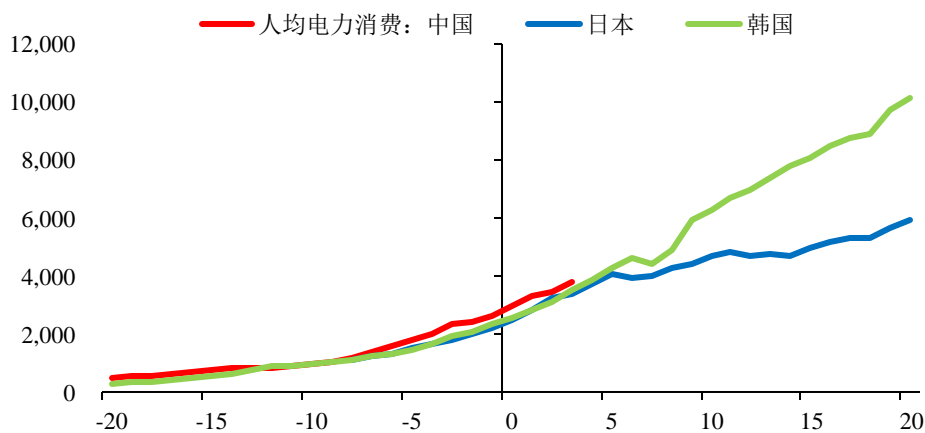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Wind, 安信证券

注: 日韩台平均是对经济转型相应阶段的日韩台实际 GDP 增速的算术平均。

如果该图所显示的历史经验大体可信, 并且能够对预判未来的经济走向提供合理借鉴, 那么我们认为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减速过程应该还没有结束。从这里的数据看, 日韩台在转型结束后的平均增速大约在 4-5% 之间。

我们沿着相同的思路比较了东亚经济体在转型阶段的人均电力消费量。如图 2 所示,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我国所经历的人均电力消费的提高与对标阶段的东亚经济体十分接近,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我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在转型过程中有较多可比的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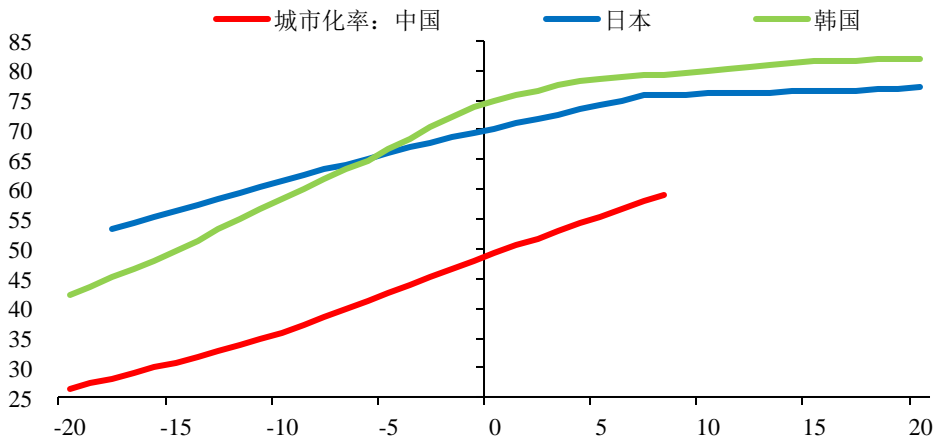
图2：转型中的人均耗电，千瓦时/年



数据来源：Wind，安信证券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经济转型的指标是城市化率。从表面上来看，如图3所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始终大幅落后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在可比阶段的水平。

图3：转型中的城市化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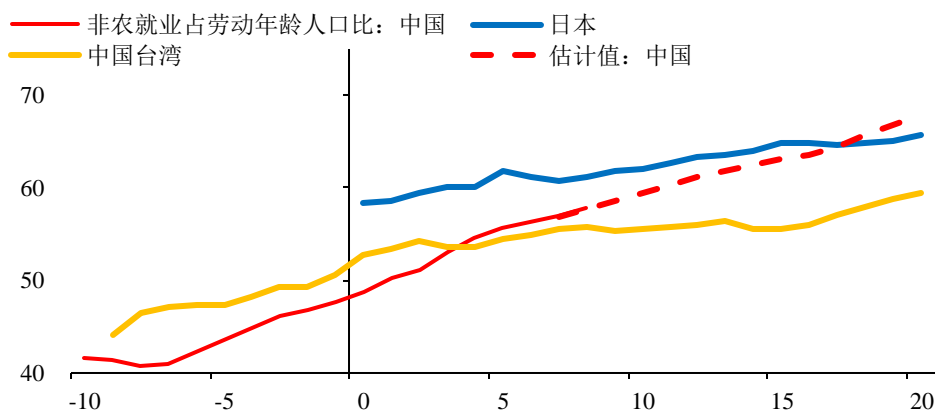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安信证券

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的转型，似乎与这样的城市化数据不完全一致，重要的原因在于城市化率这一指标在定义和计算上存在诸多困难，比如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统计技术上的困难。再比如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东亚经济体，老年人难以实现城市化，而且老年人实现城市化本身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意义也十分有限。

我们尝试构建了另外一个指标，即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如图 4 所示，该指标显示了中国经济所经历的深刻的内部转型，过去十年或者更广泛地说，过去四十年中国所经历的转型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相比毫不逊色。

图4：转型中非农就业占适龄劳动人口比，%



数据来源：Wind，安信证券

注：劳动年龄人口指 15-64 岁人口；在估算中，我们假设中国每年新增非农就业维持 2016-2018 年均值，每年新增非农就业 598.8 万人。

该指标对我们预判 2020-2030 年的经济增长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是如果我们把该指标作为中国真实城市化率的合理度量，从该指标来看，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很可能已经进入了晚期，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基本会结束，或者至少会大幅放慢。

二是观察图 4 的虚线。这些虚线的基本想法是，如果中国城市经济部门第二、三产业每年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维持在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我国非农就业占全部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将逐步超过日本同一发展阶段的水平。

总结而言，考虑到适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而适龄劳动人口中在城市经济部门工作的比例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在该水平上继续维持当前的上升速度将会

变得越来越难。

第三，我们来评价过去十年中国可贸易部门竞争力的提升。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服务业的兴起是城市化的继续，同时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和可贸易部门也在高速增长，这一高速增长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技术基础。

如何来看待过去十年中国可贸易部门竞争力的提升？我们使用两个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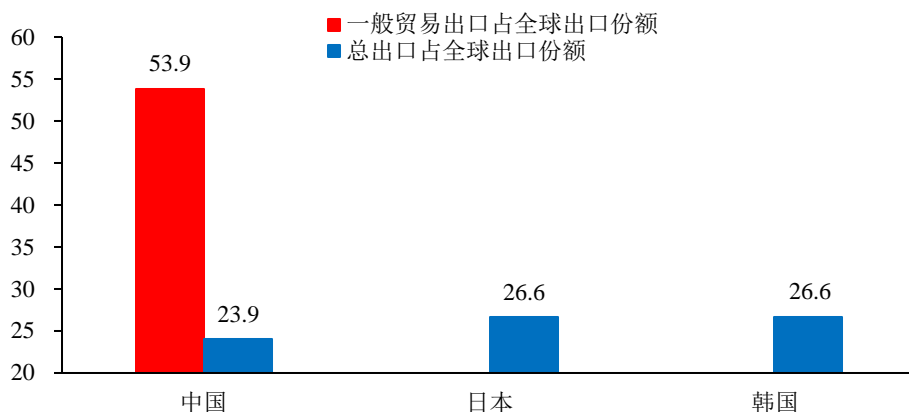
第一个角度来观察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变化，一个相对易于计算和比较的指标是中国的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的变动。如果中国出口品的竞争力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在提升，那么中国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将上升。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这使得中国的总出口量被放大。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影响，我们把中国的出口分为两个指标，如图 5 所示，红色柱状图代表中国的一般贸易出口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变化，蓝色柱状图代表一般贸易加上加工贸易后市场份额的变化。

在经济转型开始以后的 8 年时间里，日本出口品国际份额提升约 26%，与韩国接近，而包含加工贸易在内的中国出口份额提升的幅度约 24%，不包括加工贸易中国出口份额的提升是 54%。

换言之，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力驱动的加工贸易在过去 8 年大幅萎缩，但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的一般贸易出口份额大幅提升。即便把加工贸易包括在内，我国整个出口份额的提升跟日韩同期也非常接近。从这一角度来观察，中国过去 8 年时间里，经济转型后所经历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处于正常水平，甚至比日韩的水平略好一些。

图5: 转型开始后 8 年出口份额累积提升比例, %



数据来源: Wind, 安信证券

注: 累积提升比例计算方法为: 经济体 8 年内出口提升份额/该经济体转型元年份额。

出口部门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还可以表现为出口部门工人工资水平的大幅增长, 或者表现为本国汇率的大幅上升。从一般意义上讲, 制造业可以进行国际贸易, 这意味着制造业竞争的背后是从事制造业活动的劳动力之间的竞争, 这种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要考虑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劳动力的创造力、劳动的技术复杂程度以及他们相对工资水平的高低。所以可贸易部门竞争力的变化, 我们认为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是观察可贸易部门工人工资水平变化和汇率变化。

预览已结束, 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8489](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8489)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